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

总主编：何其莘 仲伟合 许 钧

翻译概论

On Translation

许 钧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概论 = On Translation / 许钧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2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何其莘,仲伟合,许钧主编)
ISBN 978 - 7 - 5600 - 8192 - 2

I . 翻… II . 许… III . 翻译—理论—研究生—教材 IV . H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3211 号

出版人:于春迟

项目负责:都帮森

责任编辑:都帮森

封面设计:刘 冬

版式设计:张苏梅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http://www.fltrp.com>

印 刷: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9.50

版 次: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600 - 8192 - 2

定 价:35.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81920001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

编写委员会

总主编：

何其莘 仲伟合 许 钧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 军	王克非	王宏印	王维东
王斌华	仲伟合	任 文	孙致礼
许 钧	何 群	何刚强	何其莘
李 力	李长栓	陈宏薇	陈建平
姜秋霞	胡显耀	赵军峰	柴明颖
秦亚青	傅勇林	谢天振	詹 成
廖七一	穆 雷		

总序

改革开放 30 年，助推中国翻译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勃勃生机，蔚为壮观。今天的翻译，无论在规模、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上，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史无前例的。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作为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先导力量和与世界沟通的桥梁，翻译的作用愈发突出。然而，在翻译需求不断攀升的同时，作为翻译人员主要培养阵地的高校，却日益暴露出其在翻译教学与实践之间的脱节问题。毕业生翻译技能不扎实，知识面狭窄，往往难以胜任不同专业领域所需的高层次翻译工作，致使翻译领域特别是高级翻译领域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不能满足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这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对高水平翻译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促进中外交流，培养高层次、应用型高级翻译专门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2007 年 1 月 23 日第 23 次会议审议通过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是我国第 18 个硕士层次的专业学位，其设立无疑是继 2006 年教育部批准试办翻译本科专业后我国翻译学科建设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果，为我国培养高层次、应用型、职业化的翻译人才提供了重要途径，为我国翻译学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我国的外语学科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及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需要，适应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在培养目标、师资要求、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和手段这四点上都与传统的翻译方向研究生教育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按口译或笔译方向训练学生的口笔译实际操作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为满足翻译实践积累所需要的百科知识。这一点与传统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中的翻译研究方向侧重培养学生的外国语言文学理论研究能力、学术研究能力以及就业为导向的教学能力的培养目标差别很大。第二，对学生实践能力的高要求和培养目标的应用型导向，也要求承担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学任务的教师必须具有丰富的口译或笔译实践经验，并了解翻译教学的原则。第三，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

的翻译教学有别于外语教学中的教学翻译。翻译训练不是作为一种检测学生语言能力、水平的手段，而是建立在学生双语交际能力基础之上的职业技能训练，包括译前准备、笔记方法、分析方法、记忆方法、表达方法、术语库的建立等，专门训练学生借助语言知识、主题知识和百科知识对源语信息进行逻辑分析，并用另一种语言将理解的信息表达出来。最后，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专业化的翻译教学需要的是双语交际环境、特定的交际对象和交际主题，还要考虑到翻译用人单位的需求等，要求学生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中文基础和至少通晓一门外语，同时还要具备广博的其他学科（如经济、管理、法律、金融等）知识和实际翻译操作技能。另外，专业翻译人员培养还特别强调要忠实地表达讲话人/作者的想法或信息。因此，翻译作为一个职业（无论是兼职还是全职），专业化程度高，应用性和操作性都很强。要培养职业化高级翻译人才，现行外语教学体制是难以完成的。

职业化的翻译教育也因此需要专门化的教材。该教材体系应根据职业翻译人才的知识结构“双语知识、百科知识、翻译技能知识”三个部分来设计。专业翻译课程的设置也都是根据培养单位的师资特点及教学资源围绕上述三个板块安排的。因此，专业翻译教材应该至少包括口译技能类、笔译技能类、通识教育类、口笔译理论类等类别。正是在上述原则及《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指导下，我们在2007年底组织国内多位了解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并一直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研讨，并着手编写国内第一套专门面向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系列教材。该套教材包括口译技能、笔译技能、翻译理论、通识教育及翻译工具书五个类别。整套教材以翻译职业技能训练为核心，以适当的应用型翻译理论为指导，配合不同学科领域的专题训练，旨在完善学生翻译学科知识结构，提高学生口笔译实践能力。在本系列教材全体编委的努力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具备以下特点：

（1）口笔译训练的技能化。全面介绍翻译技能。以口译类教材为例，包括口译的记忆、笔记、数字口译、口译语篇分析、口译预测、语义识别、口译译前准备等技能；同声传译则介绍同声传译的概论、视译、应对策略等。

（2）口笔译训练的实战性。笔译的选材基本是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真实文本材料；口译则尽可能选用全真会议资料，而且题材范围涉及政治、外交、经济、文化、高科技、法律等多方面。

（3）口笔译训练的专业化。所介绍的口译技能、笔译技能等均为目前国内外口笔译质量评估及口笔译专业认证考试测试的主要方面，通过对本系列教材的学习可以了解职业化翻译培训的程序与内容。

(4) 口笔译理论的指导性。对应用型的高水平翻译人才来说，树立正确的翻译观，掌握相关的翻译基础理论是非常重要的。本系列教材所涵盖的翻译基础知识和口笔译理论应努力领会和掌握。

(5) 通识教育的融通化。口笔译实践要求掌握英汉两种语言的相关知识及跨文化交际知识，本系列教材中的通识类各分册对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其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MTI 职业化人才培养的教学理念和面向实践的教学导向在目前的翻译教学界还是新事物，对其进行不断的探讨、丰富并开展教与学的交流是必要的，也将对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发展大有裨益。外研社这套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系列教材在开发之初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在教材出版的同时，也将推出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学资源网，不仅指导系列教材的科学使用，也希望能够汇教学实时动态、集各方意见反馈、倡教学经验交流、促学科长远发展。

中国职业化翻译人才的培养才刚刚起步，需要译界、学界同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教材建设是专业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我们也希望借编写本套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材的机会为刚刚起步的中国职业翻译教育尽一份绵薄之力。本套教材的编写力求科学性、指导性和前瞻性，但内容等方面也难免有不尽完善的地方。希望通过本系列教材的编写，与关心中国翻译事业和从事翻译职业的同仁、同行一起关注我国翻译和翻译教学事业的发展现状，以及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实施和发展，进一步探讨高层次专业化翻译人才培养的模式和途径。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编写委员会

2009年3月

前言

翻译活动是人类一项历史悠久的跨文化交流活动。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翻译逐渐担负起了促进世界各族人民相互对话、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重任。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长葆青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史上两次外来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补充，一次是从印度传来的佛经文化，另一次是从西方传来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这两股洪流能够汇入中华文化的大河，应该说翻译活动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与促进作用，因此季羡林将翻译比作“万应灵药”，并感叹“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进入 21 世纪之后，翻译的重要性得到了全方位的凸显。一方面，全球化使得中国进一步加强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交往和联系，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交流和合作越来越频繁，对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引进和吸收力度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国力得到了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提高，同时也有必要将自身的优秀文化、科学技术介绍到国际上去，以促进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文化的输入还是输出，都离不开翻译这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在新的形势下，翻译愈加体现出其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维护世界民主与和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将培养高层次、应用型的翻译专门人才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2007 年 3 月 30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文，正式批准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以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高水平翻译专门人才。2007 年 5 月，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国内 15 所大学获准首批设立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点。翻译专门人才的培养得到了高度重视，无论是在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育方法，还是在师资建设、教材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工作。从教育方面看，我们知道，一名合格的翻译人才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其知识结构必须是立体化的。对翻译专门人才的培养，应该处理好技与道、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具体地说，我们觉得，在加强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翻译技能的训练的同时，不可忽视对学生知识面的拓展和理论素质的培育。我们认为，翻译理论素养的培育和翻译基础理论的学习，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翻译活动的本质，认清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性质，明确自己所肩负的重任，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从而更好地为国际

交流服务。因此，翻译基础理论教学应当作为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基于这样的认识，根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的要求，在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接受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约请的这部《翻译概论》的编写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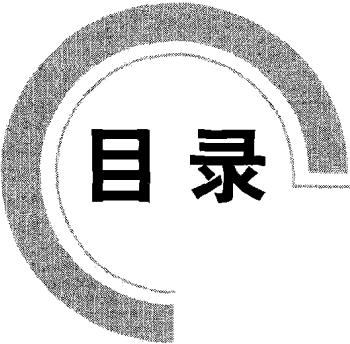
我们深知，编写一本适用于翻译硕士专业教育的基础理论性教材实非易事，既要符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精神，又要考虑到当前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实际情况。在尽可能了解国外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情况的基础上，我们结合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的精神，就“翻译概论”课的教学目标与要求与国内同行进行了交流和探讨。我们认识到，“翻译概论”课的设置，主要目的在于让学生全面认识翻译、理解翻译，对翻译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有所了解，进而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过程、翻译的对象、翻译的主体、影响翻译的因素、翻译中的基本矛盾、翻译的功能、对翻译的评价以及多元文化语境下翻译的精神和使命有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刻的认识，树立正确的翻译观，提高翻译技能，以更好地从事翻译工作。鉴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教材编写中紧紧围绕“翻译”两字，以问题为中心，内部和外部结合，宏观与微观兼顾，对有关翻译的各个重要方面展开思考和讨论，尽可能地让教材内容一目了然，便于学生在较短时间内有效地掌握重点，把握难点，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对翻译问题进行思考与探索。

在编写中，我们也特别注重教材的系统性和实用性。其系统性主要体现在以翻译为中心，对翻译问题的思考步步深入，全面关照，论述重点突出，理论问题尽可能讲深讲透；其实用性在于理论线索清晰，提出了翻译实践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线索，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了解翻译、理解翻译，一步步地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

这部《翻译概论》应该说是国内首部同类型的教材，我们深知这样一部教材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在编写中，我们给从事“翻译概论”课教学的教师留下了探索的空间。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各位教师可依据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和任务，对教学内容进行扩展和补充。对教材中涉及不多的问题，例如翻译历史、翻译现象和翻译人物等，教师可以在实际教学中组织学生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对于教材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我们恳请翻译研究和教学界的同行能够向我们提出宝贵意见，群策群力，为培养新时期优秀翻译人才而共同努力。

许 钧

2008年10月于南京大学研究生院



目录

第一章 翻译概说	1
1.1 绕不过去的问题	2
1.2 问题之一：翻译是什么？	4
1.3 问题之二：翻译的是什么？	7
1.4 问题之三：翻译有何作用？	9
1.5 本教材编写思路	12
第二章 翻译是什么？	15
2.1 翻译的历史概述	16
2.2 翻译活动的丰富性	22
2.3 语言学视角下对翻译的认识	26
2.4 研究视角的多元整合	29
2.5 译学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33
2.6 翻译之特性	37
第三章 翻译是如何进行的？	43
3.1 狹义的翻译过程	44
3.2 理解活动的基本特征	55
3.3 广义的翻译过程	63
3.4 文本生命的拓展与延伸	66
第四章 翻译什么？	73
4.1 什么是意义？	74
4.2 对意义的确定性和客观性的重新审视	81
4.3 意义的分类	87
4.4 在交流中让意义再生	93

第五章	谁在翻译？	105
5.1	谁是翻译的主体？	106
5.2	译者身份的传统定位	109
5.3	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114
5.4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120
第六章	有什么因素影响翻译活动？	127
6.1	文化语境与社会因素	128
6.2	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	141
6.3	翻译动机与翻译观念	148
6.4	语言关系与翻译能力	155
第七章	翻译活动会遇到什么矛盾？	163
7.1	可译与不可译之矛盾	164
7.2	异与同之矛盾	176
7.3	形与神之矛盾	183
7.4	三对矛盾的关系	191
第八章	翻译有什么作用？	197
8.1	对“译何为”的理论思考	198
8.2	翻译的历史定位	200
8.3	文化视角下的翻译之“用”	208
8.4	翻译价值面面观	215
第九章	如何评价翻译？	223
9.1	翻译批评的本质	224
9.2	翻译批评的价值与功能	226
9.3	翻译批评的类型	233
9.4	翻译批评的主体	236
9.5	翻译批评的标准	240
9.6	翻译批评的原则	246
第十章	如何在多元文化语境下认识翻译与研究翻译？ ...	253
10.1	文化多样性与语言多元	254
10.2	多元文化语境下翻译的使命	260
10.3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	266

主要参考文献	279
推荐阅读书目	287
本书主要外国人名中外文对照表	289
后记	297

第一章

翻译概说



本章要义：

- 要研究翻译，诸如翻译的本质、翻译的可行性、翻译的功能、影响翻译的因素、翻译与文化交流的关系等问题都是绕不过去的。
- “翻译是什么”的问题涉及对翻译本质的讨论。只有将翻译活动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通过考察影响、制约它的种种内外部因素，才能更好地界定、理解这一渗透到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重要活动。
- “翻译的是什么”的问题涉及对翻译中的意义与交流问题的讨论。对意义的探究之于翻译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关系到对人类交流的可能性及可能性程度的理解。
- “翻译有何作用”的问题涉及对翻译功能的探讨。历史上，翻译对于同一民族内部的文化传承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对它的历史作用给予正确的评价和定位。

1.1 绕不过去的问题

谭载喜在《西方翻译简史》一书中指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两个原始部落间的关系，从势不两立到相互友善，无不有赖于语言和思想的交流，有赖于相互理解，有赖于翻译。”¹如果说翻译是一项古老的活动，那么，对翻译的思考似乎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它几乎是伴随着翻译活动的产生而产生的。但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翻译的话题，好像一直是翻译家的事。而翻译家由于更多地将精力集中在实践上，在谈论翻译时往往局限于技的层面，讨论最多的也往往是“怎么译”的问题。

自20世纪后半叶起，情况有了改观，翻译问题不再只是翻译实践者们所关心的问题了，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以及历史、文化、文学等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对翻译问题都开始产生了一些兴趣。尤其是语言学界，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予以了特别关注，发表了奠基性的研究著作，如苏联的费道罗夫（A. V. Fedorov）于1953年发表了《翻译理论概要》（*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1963年，法国著名语言学家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出版了重要著作《翻译的理论问题》（*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1965年，英国的卡特福德（J. C. Catford）出版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乔治·穆南的研究非常明确，那就是要超越翻译的实践，在理论的层面探讨翻译的基本问题所在，以确立翻译研究的必要性。他指出：“翻译活动这一实践性的、重要的活动在各个领域中发展迅速……翻译是建立在言语操作基础之上的活动，继续以各种借口将其排除在一种语言科学之外，继续将其限制在低级经验主义的层面是有悖常理的。”²因此，他建议“在最新、最具权威性的语言学成果的启发下”³来研究翻译。乔治·穆南和卡特福德等学者的研究与探索所代表的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界出现的语言学转向。自此，人们对翻译的认识逐渐从实践和技术的层面上升到了理论的层面，开始将目光转向对翻译本质及一系列深层问题的探讨。

近二十年来，翻译越来越多地受到各行各业人士的关注和讨论。特别是近年来，在国际上，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些声音：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符号学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成立九百周年的

¹ 《西方翻译简史》，谭载喜著，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页。

² Georges Mounin: *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 Paris, Gallimard, 1963, pp.7–8.

³ *Ibid.*, p.7.

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寻求沟通的语言”的演讲，他宣称：“当代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翻译是可行的吗？”¹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也将翻译概念视为他的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他指出：“哲学的论题即是这种普遍意义上的可译性，它说的是，意义或真理在语言之间传递时，不会受到本质的伤害……既然哲学的原点是翻译或可译性论题，那么可以说，翻译的失败就是哲学的失败。”² 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Joseph Hillis Miller）在于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上，曾明确指出：“翻译问题是比较文学的中心问题。”³ 印度学者特贾斯维尼·尼朗贾纳（一译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在1992年出版了《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和殖民语境》（*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一书，认为“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要“把译文置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进行考察”⁴。美国学者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其主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导论中明确指出：“翻译应该被作为一种文化策略来研究，不同的文化制定出这些策略，以应对它们界限之外的东西，并以此来保持它们自身的特征——这种策略最终属于改变和生存的领域，而不是辞典和语法的领域。”⁵

在国内，我们也发现不少学科的学者开始把注意力投向翻译问题。比较文学专家乐黛云指出：“而今比较文学的翻译学科不能不面对语言差异极大的不同文化体系，文学翻译的难度大大增加，关于翻译的研究随之成为比较文学学科当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⁶ 哲学家苗力田在汉译《亚里士多德全集》总序中这样写道：“古代外国典籍的翻译，是一个民族为开拓自己的文化前途，丰富精神营养所经常采取的有效手段。这同样是一个不懈追询，无穷探索，永远前进的过程。求知是人之本性。”⁷ 德国哲学研究专家倪梁康从根本上提出：“译，还是不译——这是个问题。”⁸

这些多样的声音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个有关翻译的问题：翻译是什么？翻译是可行的吗？翻译有何作用？哪些因素影响着翻译？翻译与文化之

1 《跨文化对话》卷四，乐黛云等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5月，第4页。

2 《德里达：翻译与解构》，单继刚，《世界哲学》，2006年第1期，第58页。

3 《文艺报》，2000年8月29日，第3版。

4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郭建中编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9页。

5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10.

6 《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发展趋势》，乐黛云，《文艺报》，1998年9月1日第2版。

7 《亚里士多德全集》，苗力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8 《译，还是不译——这是个问题》，倪梁康，《读书》，1996年第4期，第78—83页。

间，与道德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等等。要研究翻译，思考翻译，这些问题始终是绕不过去的。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或尝试性解答，则构成了翻译理论研究的中心。

1.2 问题之一：翻译是什么？

1.2.1 对翻译的不同定义

研究翻译，对“翻译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我们知道，翻译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样的形式。从表达的形式来看，翻译有口译和笔译之分。一般认为，口译活动的历史比笔译活动的历史要久远得多。法国翻译理论家米歇尔·巴拉尔（Michel Ballard）指出西方“有关口译活动的最早记载，见于公元前两千多年的上埃及埃利潘蒂尼岛的古王国王子的石墓铭文”¹，而根据中国翻译史研究专家马祖毅推测，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最早的口译活动。关于中西方的笔译活动，据记载大约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而且均与对宗教典籍的翻译有关。从操作者来看，翻译活动可以分为“人类翻译”和“机器翻译”。从领域来看，翻译活动可以分为“文学翻译”和“技术翻译”。从程度来看，翻译活动尤其是笔译活动除了逐字、逐句、逐章节的全译之外，还存在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写等多种形式。

历史悠久、形式多样的翻译活动给人们对“翻译”一词的界定造成了很多困难。“翻译”一词在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里，实在也是很特殊的：它既可以指翻译活动的主体，即翻译者；也可以指翻译的行为和过程；还可以指翻译活动的结果即译文。“翻译”一词集三种含义于一身，主体、行为与结果交织在一起，更使对翻译的界定和对其的研究显得复杂。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一书中也谈到，德语中有许多词都含有“翻译”一词的基本意义，所以“一部翻译理论史实际上相当于对‘翻译’这个词的多义性的一场漫长的论战。”² 学者侯林平将历史上人们对“翻译”一词的定义分为三个阶段，并对这三个阶段进行了研究³：第一个阶段是传统语文学研究阶段。此时人们往往借助实际经验来理解翻译，对翻译的定义则往往

¹ Michel Ballard: *De Cicéron à Benjamin: traducteurs, traductions, réflexions*, Lil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lle, 1995, p.21.

² 《翻译学——问题与方法》，沃尔拉姆·威尔斯著，祝珏、周智谋节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第19页。

³ 参见《翻译定义新探》，侯林平，《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59–63页。

是比喻式的，例如鸠摩罗什认为翻译“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有令呕秽也”，傅雷认为翻译“如临画”，“如伯乐相马”。第二个阶段是现代语言学研究阶段。此时人们在定义“翻译”时往往将目光集中在语言的对等上，例如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将翻译视为不同语言文本材料的替代¹。美国语言学家奈达（Eugene A. Nida）则对翻译作如下定义：“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²第三个阶段是当代多学科研究阶段。这一时期，随着对翻译的认识的日益加深，人们研究翻译的角度也变得更为多元，不同的学者从文化学、社会学、符号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对翻译作出了定义，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几十种，在本书第二章，我们将做更深入的讨论。

1.2.2 如何正确理解翻译活动？

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定义，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地理解翻译活动？

法国著名符号学家皮埃尔·吉罗（Pierre Guiraud）在《符号学》（*La sémiologie*）一书中将语言符号分为逻辑符号、语义符号和审美符号三类。受其启发，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了《论翻译的层次》一文，明确提出翻译具有思维、语义和美学这三个层次的观点³。文章首先指出，从根本上说，翻译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是全人类都具有思维活动这一事实，而人类思维的共性构成了翻译的思维层次。但翻译不可能囿于思维这一层次，因为思维的实现需要语言，而语言的表达过程必然受到各种不同语言的具体规律的约束。因此，翻译活动又面临着另一任务，即如何按照不同语言符号达意、传情的规律，用一种语言符号传达另一种语言符号的意义，这就构成了翻译的又一层次，即语义层次。思维层次与语义层次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思维层次是语义层次的基础，语义层次是思维层次的体现。由于思维层次是以人类思维的共性为基础的，因此便为翻译在思维层次获得等值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语义层次以思维层次为基础，但它要受到语言符号的特性的约束，因此等值的可能性自然也要受到限制。思维层次是翻译的基础层次，语义层次是翻译的必要层次，任何翻译都离不开这两个层次的活动，并分别要受到思维规律和语言规律及言语规律的约束。一般说来，完成了思维层次和语义层次的转换活动，翻译也就实现了。因为语言的主要职能在于帮助实现思维，达到传情、达意的目的，比如科

1 参见《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卡特福德著，穆雷译，旅游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2 《奈达论翻译》，谭载喜编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第10页。

3 参见《论翻译的层次》，许钧，《现代外语》，1989年第3期，第63—70页。

技翻译、应用文翻译到了语义这一层次就可以说完成了。但是，语言除了传情、达意之外，还有审美职能，对于文学语言而言，审美职能甚至是其最重要的职能。诚然，文学也有认知和表感等职能，但这些职能都统一在审美领域之内，是通过情感的中介实现的。换言之，它们都离不开美感作用，一部作品倘若不能给人以美感，那么它的一切社会职能就无法实现。因此，文学作品的翻译，除了思维层次和语义层次的活动外，有着更高层次的要求，这就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层次，即审美层次。翻译活动在思维、语义、审美等各层次有着各自的活动内容、表现形式与传达目的等要素。这些要素自身的特征与活动规律及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不同，构成了翻译层次存在的客观性。任何翻译从本质上讲都是一致的，但不同类型、不同目的的翻译具有不同层次的要求，并要受到不同层次的活动规律的约束。对翻译层次的研究及对各层次主要问题的分析，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在理论上，要为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以及活动规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实践上，要求译者遵循翻译活动的规律，克服不分层次，顾此失彼的倾向，避免翻译活动的盲目性。如果说翻译有什么标准的话，那就是一个成功的翻译不可能在一个层次完成，它应该是各个必要层次和谐统一的产物。

对翻译活动三个层次的明确区分及对其的探讨可以说是对翻译所进行的内部的、纵向的思考。但是，翻译活动不是一种置身于时空之外的静态的活动，它是翻译主体在一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中，通过具体的语言转换而进行的一种目的十分明确的实践活动，涉及众多的内部和外部因素。针对翻译活动的这些特征，笔者又于20世纪末撰写了《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一文，从翻译活动的实践性出发，对翻译活动的动态过程进行了宏观的考察，将对翻译活动的探索由内部转向了外部，由语言转向了文化。在该文中，笔者指出，翻译活动在意愿、现实和道德三个层面均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意愿层面来看，在大多数情况下，翻译活动都是一种具有目的性的活动，它总是“与某种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或社会的需要紧密相联”¹，而翻译目的无疑影响到了对翻译作品的选择、译者的翻译立场以及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从现实层面来看，不同的国家、民族在语言、文学、文化、心理等方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这些差异阻碍了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促使人们对翻译的可行性以及翻译可行的程度作出进一步的思考。从道德层面来看，一方面，翻译活动的主体是译者，而“译者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必然要受到某种道德上的约束”²，使得他不能“从心所欲”；另一方面，对翻译的评价活动同样无法摆脱作为社会意识

¹ 《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许钧，《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3期，第50页。

² 同上，第53页。